

孔门七十子之说成因考

宋 丁 羿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南京 214000)

摘要:孔门七十子之说的产生,来源于春秋晚期徒七十人的步兵编制方式。在这种编制方式下,步兵接受战车上贵族的指挥,跟随贵族一起战斗,形成一种军事化的主从关系。孔子本人具备很强的军事能力,孔门中也包含军事教育的内容。弟子们追随孔子,也十分类似于春秋时期徒从跟随贵族。在这双重作用下,当时的人们会把对徒七十人编制方式的认知投射到孔门,七十子之说也由此形成。

关键词:孔门七十子;徒七十人;军事特性;主从关系;认知投射

中图分类号:B2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143-09

关于孔子弟子的人数,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曾统计了各种记载:

《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弟子列传》“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今按:《孟子》云“七十子”,《吕氏春秋·遇合篇》“达徒七十人”,《韩非·五蠹》“服役者七十人”,《大戴礼·卫将军文子》“受教者七十有余人”。《淮南·要略》“孔子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汉书·艺文志序》、《楚元王传》“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则孔子门人,固仅有七十之数也。乌得三千哉?《淮南·泰族训》云:“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越绝书》亦同。养徒与弟子有辨,《史记》遂谓孔子弟子三千人矣。然孔子亦岂得有三千养徒者?此《淮南》据晚世四公子养客为例,深不足信。《主术训》又云:“孔丘、墨翟,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则近是矣。)七十言其成数,七二、七七,则自可无辨。^{[1]60-61}

孔子弟子人数比较常见的说法分别是七十人和三千人。钱穆认为,孔门弟子三千人是受战国养士之风影响而被夸大的结果。这个判断是合乎情理的。

战国贵族门下多有“食客三千”的记载。如《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2]2359}《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2]2377}《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蹶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2]2395}《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2]2510}而孔子弟子三千人之说最早出现于《吕氏春秋·遇合》:“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3]341}《吕氏春秋》本身出自吕不韦门客的编纂,他们在描述孔门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处境投射到孔门中,因而形成孔子弟子三千人的传说。后来的《淮南子》也出于刘安门客的编纂,相同的身份使他们易于接受《吕氏春秋》的说法,因此在《淮南子·泰族训》中这个传说又被进一步强化。到司马迁的时代,三千人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对孔门弟子人数的普遍认识,因而又被司马迁载入到《史记·孔子世家》中。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三千人”之前加了“盖”这个疑辞,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弟子三千”的传说并不完全确信。

收稿日期:2016-01-22

作者简介:宋丁羿(1985—),男,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那么较早产生的“七十子”是否就是实数？还是和“三千人”一样，来自于某种认知投射呢？笔者认为孔门“七十子”之说的出现和春秋晚期的“徒七十人”的军事编制有着密切关系。

一 《左传》中的“徒七十人”

考察《左传》，其中多有“徒七十人”的记载。《左传·定公十年》：

初，卫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4]1579}

《左传》此处记录了赵午(邯鄲午)和涉佗各带“徒七十人”在寒氏的城门口对峙的史事。所谓的“徒”，是指徒步作战的步兵。春秋时代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战斗时把一定规模的步兵和战车编制在一起，形成一个作战单元。战车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工具，同时也是一个指挥平台，贵族们于其上指挥周围步兵作战。周代史料中，多有“车”和“徒”一起称说的记载。如《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朱英绿滕，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冑朱纆。”^{[5]616}《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使乌余具车徒以受封。乌余以众出使诸侯。”^{[4]1126}这些都是战车和步兵共同编制的例证。此处的寒氏之役，因为是攻城战，没必要派上战车，所以邯鄲午和涉佗都只带了步兵。

徒兵在战争中跟随战车战斗，因此“徒”字也有了随从、部属的意义。比如《国语·晋语八》“后子谓其徒”，韦昭注：“徒，从者也。”^{[6]434}又《左传·昭公四年》“旦而皆召其徒”，杜预注亦曰：“徒，从者。”^{[4]1256}《左传·哀公八年》更有“私属徒七百人”^{[4]1649}这样明确把“私属”和“徒”连言的记载。

“徒七十人”作为贵族私属的例证，也出现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的华鬻之乱中。华氏在宋国的朝廷中拥有强大的势力，华鬻和华多僚同为司马华费遂之子，兄弟之间因为争权而不合。华多僚裹胁国君宋元公和华费遂，准备驱逐华鬻，华鬻不胜其忿，发动叛乱。但是，乱党被晋、齐、曹、卫等国军队联合镇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也记载了华鬻的归宿：

华鬻以车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楚薳越帅师将逆华氏。大宰犯谏曰：“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争国，释君而

臣是助，无乃不可乎？”(楚平)王曰：“而告我也后，既许之矣。”^{[4]1577-1578}

华鬻突围出逃，最终被楚平王收留。因为华鬻的身份是一个叛臣，此处的跟随华鬻的“徒七十人”必然不是宋国官方的军队，而是属于华鬻的私人武装。华鬻在逃亡时仍然带着这七十人，可见他们是华鬻最为倚重的亲信。

“徒七十人”有时也被称作“士七十人”。《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

楚子在申，召蔡灵侯。……丙申，楚子伏甲而脍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4]1323}

此七十人当是蔡灵侯赴会时的近卫，因为蔡灵侯是国君，地位高于一般贵族，故不称“徒”而称“士”。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以“七十人”为一个步兵军事单位和贵族结成固定的主从关系，是春秋晚期的普遍现象。在当时就有人把这种现象投射到对周代初期历史的认知中。《左传·定公四年》：“子鱼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管蔡启商，昏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4]1540}此处“以车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与蔡叔车徒而放之。”那么在子鱼的历史认知中，蔡叔在流放时，还被给予了“徒七十人”的私属。司马迁在写《管蔡世家》时也采信了这一说法：“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2]1565}（此处“十乘”当为“七乘”之讹，古文十、七形近。《太平御览》卷百五十七引正作“七乘”^{[7]387}。）然而，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却对此子鱼的这段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传之此言，皆述《书》意而为之辞，唯增言‘徒七十人’耳。”孔颖达所说的“《书》意”，是指《尚书·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的记载^{[5]227}，其中并没有提到“徒七十人”。但是，众所周知，《蔡仲之命》出于伪《古文尚书》，缺乏史料价值，一般不为学者采信。既然《蔡仲之命》不可信，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徒七十人”的编制方式真如子鱼所说的那样，自周初以来就一直存续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理由在于：如果一种军事制度是具有延续性的，那么相关的记载必然会出现现在各个历史时段中，然而考察《左传》，“徒七十人”的记载只出现在春秋晚期的昭公、定公年间，绝不见于之前的记载。事实上，在《左传》的早中期记载中，往往并不重视徒兵的人数。如《隐公元年》“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4]13}，《庄公二十八年》“子元以车六百乘以伐京”^{[4]241}，《僖公二十八年》“晋车七百乘，鞶、鞞、鞅、

鞞”^{[4]460}，《襄公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4]1102}等，都只记录了战车的乘数。徒兵人数和战车乘数同时出现的记载见诸《左传》，昭公以前可能只有《僖公二十八年》“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4]643}一条。显然，这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春秋前期战争仍以车战为主，步兵并不受重视，史书对步兵人数记载的缺乏正体现了这一点。到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各国改革兵役制度，相应的军事战术也随之改变，步兵的作用和地位日益上升。徒七十人正是作为春秋晚期主要的步兵编制方式被记录到各国的史书中。上述“七十人”的记载涉及晋、卫、宋、蔡四国，若以此四国为端点画一四边形，其覆盖面几乎包括整个中原地区。正是因为“徒七十人”的编制方式在春秋末期广为流行，成为了当时贵族们对军事形态的一般认知，因此他们才会以今律古、理所当然地把此种状态投射到周初的历史中。

春秋时期的“徒七十人”虽然和孔门“七十子”在人数上相同，但光凭数字上的一致并不能马上证明后人对孔门的认识受到前者的影响。析而言之，“徒七十人”最重要的特点有两点：一为军事性；二为主从结合的组织性。笔者欲就此两点对孔门作一个考察，以印证笔者的判断。

二 孔门的军事特性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徒七十人”首先是一种军事编制。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孔门都是以诗书礼乐的文化教育而著称的。但不应忽略的是，军事教育也是孔门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承袭自春秋时期的贵族教育。孔子创办私学的背景是春秋末期平民势力的崛起。《左传》记载赵简子的誓约中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4]1614}此“遂”字，杜注为：“得遂进仕。”这开启了平民阶层进仕的途径。平民要进入到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政治技能。孔子开办私学，把原来的贵族教育内容推向平民子弟，这就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代表“六艺”。春秋时期，尚未出现战国时那种专职化的文武分工，当时各国的卿大夫，同时也是军队的将佐，他们平时在朝处理政事，一旦爆发战争也要亲自拿起兵器，驾御战车统兵作战。因此，射御这种军事技能被引入到“六艺”教育中。《礼记·内则》言：“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注：“成童，十五以上。”^{[5]1471}十五岁就是男子身体发育达到可以学习射御的程度。当时人们甚至把是否可以驾御马车当作贵族

男子是否成人的标志。如《礼记·曲礼下》：“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5]1268}另外，《礼记·少仪》也有相似的记载，只是由大夫之子变为了国君之子：“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社稷之事矣；幼，则曰：能御，未能御。”^{[5]1513}虽然《礼记》成书年代较晚，但是在不同的篇章中都提到了贵族教育中的射御之事，足见此事并非后人向壁虚造，确实是保存了春秋贵族教育的基本形态，由此也可见射御在贵族教育中的重要性。

既然孔子要教育平民子弟使他们进入到上层的政治空间，文武兼备的才能是必不缺少的。孔子作为弟子们的老师，他本人也是精通射御的。《论语·子罕》言：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8]321}

达巷党人称赞孔子博学，孔子自谦，只是拈出射御二事，其中又着重提到了御，说明孔子对此项能力颇有自信。《礼记·射义》也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5]1687}可见孔子射术也是十分高明，足以引起人们的围观。后世子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武力过人的传说。如《吕氏春秋·慎大览》言：“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3]362}《淮南子·主术训》言：“孔子之通，智过于佞宏，勇服于孟贲，足摄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9]695}诸子之说多出好事者传言，不免有所夸饰，“举国门之关”一事甚至是把孔子之父的事迹移植到孔子身上。《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偃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郇人纆抉之，以出门者。”^{[4]975}此郇人纆即孔子之父叔梁纆。尽管如此，这些传说也足以反映出孔子的武艺在一部分人的印象中是十分高超的。

孔子本人也有亲自指挥军队的经历。一为齐鲁夹谷之盟。《左传·定公十年》：

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4]1577-1578}

春秋诸侯会盟，各带军队，如上文所举祭灵侯会楚灵王于申地，有“士七十人”从之。孔子在夹谷会盟上命令鲁国的士兵操起武器驱逐企图劫持鲁定公的莱

人,最终挫败了齐国的阴谋。“士,兵之”三字极为传神地反映出孔子当日镇定指挥的情形,足见孔子也具备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孔子指挥军队的另一经历是拆毁三桓私邑的“堕三都”事件。《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4]1586-1587}

此役鲁定公被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的叛军包围,形势十分危急,正是因为孔子指挥申句须、乐颀果断出击,才击败叛军,完成了堕费之役。虽然堕三都因为孟孙氏的阻挠没有最终成功,但孔子的指挥能力也在此役中得到充分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夹谷之会和堕三都是孔子政治生涯中最显著的事功。此二事见于《左传》,之前必然已被记录到鲁国的史书中。春秋时期,诸侯间有策书赴告的制度,某国发生重大事件都会通报于其他诸侯国。夹谷之会为会盟,堕三都遭遇反叛为内乱,这两事都是国之大事,也都有着赴告的先例。如《左传·隐公八年》:“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4]59-60}此为会盟赴告之例。《左传·成公十七年》:“高弱以卢叛。……十二月,卢降,使国胜告难于晋。”^{[4]898-900}此为内乱赴告之例。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孔子的军事声名或许即因夹谷之会和堕三都的赴告而在诸侯国中流传开来。

之后,孔子周游列国,时常有人向孔子咨询军事问题。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和孔子军事声名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如《论语·卫灵公》: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8]609}又《左传·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4]1667}

面对卫灵公和孔文子的咨访,孔子都以不懂军事相推托,实则孔子并非真的不懂军事。只是孔子希望通过推行礼乐教化来实现政治理想,而非借助于战争手段解决诸侯国内外的各种争端,故孔子在对话中举出“俎豆”、“胡簋”这类代表礼乐的事物,以致意于当时

的贵族。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孔文子准备攻打大叔疾,这属于卫国贵族间的内斗,是不合礼制的行为。如果孔文子真的了解孔子的为人,应当知道孔子是反对内斗的,因此也不便再向孔子请教军事策略。从此事可以推测,当时某些贵族对孔子的了解,似乎只是注重孔子的军事能力而非孔子对礼乐的熟习。

另一方面,在孔门内部,虽然《论语》中没有军事教育的直接记载,但孔子本人有时也会用军事活动作比喻。如《论语·先进》篇: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8]455}

冉有(求)因为帮助季孙氏聚敛财富,引起孔子的强烈不满。孔子所说的“非吾徒也”、“鸣鼓而攻之”,都是典型的军事用语。当然,这里孔子并不是要真的像战斗一样在肉体上攻击冉有,只是用了一种军事化的比喻来表达内心的愤慨。此处尤可注意的是,这个军事化的比喻得以成立,正说明了孔门弟子跟随孔子的情形正如徒兵跟随将领那样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孔子这里,原本“徒”的军事意味开始转向教育层面。考察《左传》、《国语》等春秋文献,“徒”字大多是政治或军事上的部属、随从之义,而自从孔子招收平民弟子入学、建立新的教育组织之后,“徒”字也就开始有了弟子的意义(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如《墨子·非儒下》言:“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10]306}以徒属和弟子连言,足见师徒之间的主从关系。

然而,被孔子斥为“非吾徒也”的冉有,却实实在在地从孔子那里学习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术。《史记·孔子世家》:

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2]1934}

《左传·哀公十一年》更详细地记载了郎之战的整个过程。在《左传》的记载中,冉有不仅为季康子制定了全盘的作战计划,而且还亲自统帅鲁国的左军,和孔子另一弟子樊迟一道,在鲁国右军崩溃的情况下击败齐军,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和指挥能力。此处,冉有自言军旅之事“学之于孔子”,可见在孔门军事指挥确实是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而加以传授的。而郎之战的胜利势

必使季康子之类的贵族倾向于从军事化的视角去看待孔门教育。虽然在孔门内部，孔子主要是以礼乐仁德教导学生，军事教育并不是最主要的部分，但是在孔门之外的人们未必愿意深入理解孔子教育的核心。所以，只有当冉有率军取得胜利，并告诉季康子是受学于孔子时，季康子才有“孔子何如人哉”之问。季康子愿意招纳孔子，恐怕更多的还是从提高军事实力的角度去考虑，对比之前卫灵公和孔文子向孔子咨询军旅之事就不难理解了。

季康子之父季桓子和孔子曾经同朝为官，而季康子对孔门教育尚且如此生疏，我们也不难想见同时代的其他人，他们对孔子乃至孔门的认识或许还是建立在孔子及其弟子的军事活动上，因为这些事件所影响的范围和深度都远远大于孔门内部的礼乐教育，孔门在当时人眼中也会蒙上某种军事色彩。

三 孔门中的主从关系

“徒七十人”的另一个特点是贵族和私属结为主从关系，形成一个组织集团。考察孔门内部，师徒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关系，因而有了某种教团的性质。

在孔子之前，周代贵族的教育活动都有特定的机构，这在金文中都有相关记载。如周穆王时的静簋有“王令静司射学宫”，宣王时的师簋有“在昔先王小学”，“学宫”、“小学”都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孟子》、《礼记》等战国古籍中还有对周代学校更加详细的描述，这里不一一列举。此种学校教育并没有体现出教师和生徒的主从关系性。

孔门和以往的贵族教育相比，虽然有着相似的教育内容，但是在组织方式上和过去学校化的教育截然不同。周代学校的学制，都有一定的年限，贵族们在每个年龄段也都有特定的学习内容。根据《礼记·内则》记载：“十年，出就外傅，食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5]1471}《大戴礼记·保傅》也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11]60}当相应的学业完成后，就要离开学校。而孔门则不然，弟子们一入孔子门下，就结成了终身的师徒关系。他们和孔子在一起生活，甚至要为孔子承担一定的生活事务。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12]446}明确指出七十子是为孔子服役的。根据学者陈桐生的研究，弟子们在生活上要

为孔子履行诸如侍坐、从游、仆御、出使、管家、庖人、侍卫、服丧等职责^{[13]37}。

姑举“侍坐”一事为例。孔子平时燕处闲居，常有弟子陪侍一旁。这也源于春秋时期的社交习惯，位卑者须侍奉位尊者，如《左传》中“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4]884}、“师旷侍于晋侯”^{[4]1016}、“乐王耐侍坐于范宣子”^{[4]1074}之类。而孔门的侍坐，往往处在孔子闲居的私人场合，侍坐的弟子是孔门中人其堂奥者，和孔子的关系甚为亲近。在侍坐时，孔子往往会和弟子们进行谈话，其中一些被记录到了《论语》中，如《公冶长》的“颜渊、季路侍”章，《先进》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等；弟子在应答时也各有表现，《先进》言：“闵子侍侧，阏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8]450}正是因为侍坐最能体现和孔子的亲近关系，故后世儒家在著书立说时多借此以体现学说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如《礼记》的《仲尼闲居》有“子贡入侍”、《仲尼燕居》有“子张子贡子游侍”，《大戴礼记·主言》和《孝经》都有“曾子侍”等等。侍坐之外诸事，读者可参阅陈文，此处不再赘述。在列举并分析了孔门中弟子为孔子承担的种种事务之后，陈桐生也认为：“七十子之于孔子，多少带有一些宗法化的人身隶属意味。”^{[13]39}

此外，一部分孔门弟子在机会到来时会外出为官，但是和孔子的师徒关系并不因此中断，甚至孔子还会指导弟子的政治活动。如之前所说的“堕三都”，当时子路的身份为“季氏宰”，是季孙氏的家臣；而孔子的身份，根据《孔子世家》的记载为鲁国的司寇，是公臣。按照春秋时期的一般政治规则，家臣只对主家尽忠，是没有权力介入国家事务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孙氏家臣司马鬲戾曾说：“我家臣也，不敢知国。”^{[4]1464}如果一个家臣越过自己的主家而为公室效力，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左传》记载季平子的家臣南蒯因不为季平子所礼而起兵反叛季氏，失败后逃往齐国，齐国君臣和南蒯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南蒯）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4]1364}

所谓的“张公室”或许只是南蒯为自己反叛行为寻找的一个借口，但是孔子的“堕三都”就其性质而言，确实是为了削弱三桓的“张公室”之举。子路身为季氏家臣，完全听从孔子的指挥，说明子路对老师的服从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政治规则，因而也有了某种作为孔子私属的性质。

孔子晚年为了推行政治理想而周游列国,就有一部分弟子随从而行。由于孔门这种教团式的组织模式是新生事物,许多人并不了解,因此产生了种种的误会,不止一次使孔子陷入险地。如“子畏于匡”一事,此事在《论语》的《先进》、《子罕》中虽有提及,但并没有详述经过,而《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就略为详细:

(孔子)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2]1919}

《世家》言孔子被匡人拘留,是因为他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匡人的阳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阳虎其人,虽然出身为鲁国季孙氏的家臣,但是实际把持着鲁国的国政,地位与贵族无异。可以想见,阳虎在迫害匡人时必有徒从跟随。而孔子在经过匡地时也有弟子为仆御随从,师徒的队伍更加深了匡人对孔子的误认。虽然这只是一场误会,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一般人并不清楚孔门的性质,会用贵族化的主从关系去认识孔门。

孔子遇险不止是“畏于匡”,还有一次在经过蒲地时。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2]1923}

此据蒲反叛的公叔氏当为《左传·定公十三年》之公孙戌。公孙戌图谋驱逐南子,南子进谗言于卫灵公,公孙戌反被卫灵公驱逐。孔子经过蒲地,正值其事。此处尤可注意者,孔子随从的弟子们和蒲人发生了激烈战斗(“斗甚疾”),可见孔子和弟子在周游列国时为保证团体的安全,拥有一定的武装。《孔子家语·困誓》就记载了孔子被围于匡时,“子路怒,奋戟将与战”^{[14]151}。此时被围于蒲,更有勇武弟子公良孺的战车加入,因而孔门也具有了某种军事组织的面相;而战斗的结果竟然是“蒲人惧”,首先向孔子作出让步,则孔门的战斗力之强也可见一斑。

当然,弟子们愿意像春秋时期的徒从跟随贵族一样跟随孔子,是为孔子高尚的道德魅力所吸引。正如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5]211-222}孔子本人并不会把自己的弟子看成自己的仆人,弟子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孔子服

务,但是一旦弟子们有悖礼出格的举动,也是会受到孔子责备的。如《论语·子罕》: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8]341}

皇侃《论语义疏》引郑玄说:“孔子尝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礼也。”^{[16]219}这是郑玄根据“无臣而有臣”一句作出的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子路这么做肯定是违背礼制的,因而引起孔子的强烈不满。从子路本人的立场上讲,他曾经跟随孔子发动堕三都之役,接受过孔子的军事领导,此时肯定是发自内心地把自己和孔子置入到一种主从关系之中。

此外,子路尚有为孔子请祷一事,更能证明子路的这种看法。《论语·述而》: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谏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8]283}

子路因孔子生病而祷告于鬼神,引起孔子的质问,子路举出一篇诂文的语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孔子说出“丘之祷久矣”这样的话,显然是对子路行为的否定。言外之意就是说:既然我本人已经祷告很久,那么你也用不着替我祷告了。对于这一点,古今注家都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孔子否定子路的原因是什么?却颇多歧说。笔者认为,孔子对子路的否定,和“为臣”之事一样,是出于礼制上的原因。在周代,只有天子、国君等高级贵族才能使臣子为其祷告。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尚书·金縢》中的周公为武王祷告,整个过程还有“为坛于南方,北面立焉”,“植璧秉珪”的隆重仪式,最后还要“纳册于金縢之匮”^{[5]196}。这些情况记录在史书中,足见祷告一事甚为重大,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找人代替的。春秋时期也有臣子为国君“请祷”之事。《左传·襄公十年》:“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着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4]977}晋悼公得病,荀偃、士匄俱为晋国卿一级的重臣,才有请祷之权。虽然后来此事因为荀偃的劝阻,没有完成,但从中也可窥见此在礼制上的重要性。而孔子本人此时实际已不具备请人祷告的资格,故子路所为又引起了孔子的不满。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子路为代表的部分孔门弟子确实实是把自己和孔子看作一种类似于私属和主君的关系。这也成为后世孔子为“素王”之说的一个源头,当然更会影响到孔门外部的人对孔门性质的认识。

在孔子去世后,部分弟子欲推举有若为孔门新的领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言: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15]39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2]2216}

按照《孟子》和《史记》的说法,在孔子去世后,部分孔门弟子欲奉有若为师,是因为有若长得像孔子。这其实也只是个表面原因。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孔门教团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在这个团体内部必须要有一个类似于孔子的领导者,在孔子去世后承担起维系团体并光大孔子学说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有若的支持者如子夏、子张、子游等都是孔门的重要弟子,他们在师门中的地位并不比有若低,根据《礼记·檀弓下》的记载,子游甚至还反驳了有若废除“丧踊”的打算^{[5]1304}。他们之所以愿意推举有若为孔门的新领袖,正是为了继续维系孔门的完整性。然而,这个举动引起了以曾子为首的部分弟子的反对。曾子认为孔子的地位至高无上,不是他人可以取代的。而另一些弟子对有若的试探,也证明了有若本人并不具备成为新领袖的资质和威望。曾子和部分弟子反对立有若为师,当然是出于对先师孔子的崇敬,但是因为没有产生出一个新的领袖,客观上却促成了孔门的内部分裂,孔门作为一个完整的实体组织从此不复存在。之后,一些弟子周游各地,建立起新的宗派。这些宗派就其组织性而言,正是孔门具体而微的缩影。

综合孔门的军事化色彩和主从性组织关系两点,笔者判断,“七十子”之说来自于孔门之外同时代的人把“徒七十人”的特性比附到孔门之上,而到孟子之时,经过了一百多年,“七十人”在春秋时期的本来内涵已经被人遗忘,“七十子”作为一个符号也就成为孔门弟子的专门称谓。

四 孔门七十子之说的影响和衍生

孔门“七十子”之说来自于春秋时期“徒七十人”的认知投射,但是当七十这个数字和孔门结合并固化到当时人的内心之后,反过来人们也会把此种认识投射到孔子之前的历史中。

先秦典籍记有“周公下士七十人”一事。《墨子·贵义》言:“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10]445}此“漆”即“七”字的通假。墨子此说影响也十分深远。后来的《吕氏春秋·下贤》对此事说得更加细致:“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3]371}而刘向编辑的《说苑·尊贤》篇中,更是借孔子之口道出了周公尊贤下士之举:“孔子曰:‘……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岂无道哉?’”^{[17]193}

对于周公“下士七十人”和孔门七十子之称的关系,学者刘全志在《论孔门“七十子”之称的由来和流变》一文中称:“周公是儒家最为推崇敬仰的圣人,如子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门弟子经常把孔子与周公并提,《孟子》中就有‘悦周公仲尼之道’。且孔门自孔子始,都有模仿先贤行为的趋势,如《尚书大传·殷传》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等。‘周公夕见七十士’的行为,应为孔门弟子所广知,加上他们的膜圣心理,进而称孔子弟子为‘七十子’,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孔门后学如孟子者追踪圣迹的必然趋势。”^{[18]383}刘先生认为孔门七十子之称是对“周公下士七十人”的模仿,是孔门后学追寻圣贤的表现。

笔者认为,孔门七十子之称并非对“周公下士七十人”的模仿,恰恰相反,“周公下士七十人”是后人把孔门七十子之称投射到周公那里,我们断不能把“周公下士七十人”认定为西周初年的历史事实。在西周宗法制的政治体制中,贵族和平民在礼制上有着严格的界限,虽然平民拥有某些表达自己政见的渠道和方式,如《左传》中所记子产不毁的“乡校”、平民借以发表意见的各种歌谣等等,但总体来说,贵族对平民意见的听取是被动的,绝不会出现贵族一日之间如此频繁接见平民的事例。此种带有“尊贤下士”观念印记的传说,乃是春秋战国之际宗法社会崩溃、平民开始跻身到上层政治体制,为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而创造出来的。而孔子开办私学,就有为平民子弟提供进入上层空间的渠道、进而改造现实政治的初衷在内。孔子弟子中也不乏颜回、原宪这样之人,如《吕氏春秋·下贤》所说“穷巷之中、瓮牖之下”生活极端贫困的人。从孔子开办私学开始,平民子弟有了进身上层政治空间的可能,因而他们会创造出周公下士的传说,来为自身的政治

诉求提供历史依据。周公本身是周初重要的政治家,又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因此孔门中的某些特性被移植到周公那里也就不足为怪了。

周公下士的传说还有另一个类型,见于《荀子·尧问》篇,这次是周公自言:“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吾于天下不贱矣。然而吾所执贄而见者十人,还贄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19]350-551} 同样,《韩诗外传》卷三、《说苑·尊贤》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所见者的分类和具体人数和《荀子》略有出入。在此种类型传说中,周公所接见者远大于七十人。正是从这种数字记载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周公下士”一事出于后世编造的性质。

同时,在儒家内部,七十人之称也随着儒学的传承而不断延续。前面已经提到,在孔子逝世后,孔子的弟子们各立宗派,收授生徒,正是孔门具体而微的缩影,其中也有弟子七十人的记载。《孟子·离娄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害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15]603}

沈犹行称“从先生者七十人”,或为曾子弟子。闻一多注意到了这里数字七十的记载,在其《七十二》一文中论证称:“曾子弟子也七十人,不会如此凑巧。大概曾子弟子的人数本不可知,只因他是传孔子道统的,所以姑依孔子弟子的人数来假拟他的弟子的人数。”^{[20]176} 闻氏认为曾子弟子七十人也是对孔门七十子之称模仿,这是极为合理的。

秦朝建立以后,随着儒生们进入秦廷成为博士,孔门七十子之称也影响到了当时博士官的组织形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侯生与卢生密谋,其中有“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之语^{[2]258},博士们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活动中以备皇帝顾问,见诸《史记》者,如《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2]254},《封禅书》言秦始皇“东巡郡县,祠骑峰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2]1366}。《说苑·至公》也言:“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17]347} 这些记载都证明七十人正为秦代博士

官的定员,显然这也是受到孔门七十子之说的影响。

另外,孔门弟子人数,尚有七十二和七十七人之说。这两种说法出现较晚,可以看作是在七十子之说基础上的衍生。从七十到七十二、七十七,此种数字记载的精确化正是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一个印证。

闻一多在《七十二》一文中,更着重讨论了“七十二”这个数字和孔门弟子人数结合的过程。在先秦秦汉之际,数字“七十二”和当时的天道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意味。《礼记·月令》记有“七十二候”,是古人对一年中物候划分的结果。在战国秦汉之际术数化天人关系的构建过程中,此数字也被附会到人事上。《史记·高祖本纪》言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2]342},《封禅书》言“封禅七十二王”^{[2]1393}。孔子和数字七十二发生关系,也并非仅限于弟子七十二人一事。《庄子·天运》言:“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21]531} 此处“七十二君”显系虚指,不得认为实数。而“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之说,也与上述诸例相似,是作为一种术数附会而广泛流传于秦汉之际。

七十七这个数字,来自于司马迁本人的统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载的孔子弟子数正是七十七人。但是,司马迁这份名单颇有遗漏。清代朱彝尊撰《孔子弟子考》,曾对古籍和碑刻中记载的孔子弟子人数有一个更详细的统计:

《家语·弟子解》七十六人,又与叔孙会合传有孔璇,又别见者惠叔兰共七十八人。《史记·弟子传》七十七人,别见《孔子世家》者有颜涿聚,共七十八人。苏辙撰《古史》著录七十九人,《家语》有而《史记》无者:琴牢、薛邦、申续、陈亢、县亶也。《史记》有而《家语》无者:公伯寮、郑国、申棠、鄒单、秦冉、颜何也。益以文翁礼殿之廉瑀、林放,鲁峻石壁画像之子服何,《礼杂记》之孺悲,《射义》之公罔之裘、序点,《春秋左氏传》之仲孙何忌、仲孙阅,《晏子》之鞠语,《孟子》之牧皮,《庄子》之常季,通计九十八人。^{[22]18}

朱彝尊统计出九十八人的数字,远远要高于司马迁的七十七人。而《礼记》、《左传》、《孟子》又都是儒家内部的传记,所记孔子弟子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却没有被采入,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疏漏。因而,我们也无法把七十七人认定为对孔门弟子人数的精确记录。

参考文献:

-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7]张文虎.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校刊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9]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0]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3]陈桐生.孔门七十子开创的学规门风[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37-42.
- [14]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M].上海:上海书店,1987.
- [15]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6]皇侃.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7]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8]刘全志.论孔门“七十子”之称的由来和流变[J].保定学院学报,2010,(1):83-86.
- [19]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0]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2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2]朱彝尊.孔子弟子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The Cause of the Statement of “Confucius’ Seventy Disciples”

SONG Ding-yi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4000, China)

Abstract: Statement of “Confucius’ Seventy Disciples” originated from a kind of popular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which seventy infantrymen fought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leader and a relationship of subordination was therefore built. Confucius himself was proficient in military skills and military education was also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Confucius’ education system. can be compared to the organization of seventy infantrymen following noblemen. According to the two points above, people at that time would understand Confucius’ education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ode of seventy- infantryman organization, and so emerged the statement of “Confucius’ Seventy Disciples”.

Key words: Confucius’ Seventy Disciples; seventy-infantryman organization military;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 subordination; cognitive projec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